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二八冊

吐蕃僧諍記（上）

Paul Demiéville 著 耿昇譯



中國書店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PDF

本册說明

本書作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是當代法國著名的漢學家。在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先後投在當時西方的漢學名流席微葉和沙畹門下，陸續學習了日文、梵文、藏文和印歐語系許多語種。戴密微 1918 年在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畢業後，于 1919 年成爲當時設在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的公費學員。他 1919 年赴中國考察，1924—1926 年間在廈門大學執教席，講授梵文和西方哲學。戴氏中國學著作共 160 多篇（部），書評 100 多篇。

《吐蕃僧諍記》一書就是他于 1952 年作爲《漢學研究所文庫》第八卷而出版的藏學、敦煌學和佛教學名著。《新編佛學名著譯叢》將之分爲上、下兩部分，分別爲 128、129 冊。該書涉及到了唐史、吐蕃史、唐蕃關係史、西域史、佛教史、禪宗入蕃史、吐蕃進出中亞史諸領域。他的學生和事業繼承人後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和科學院院士的謝和耐先生于 1979 年在《通報》中撰文稱該書“每一條注釋都堪稱百科全書的一大條目”。日本著名敦煌學家藤枝晃也稱該書是“當代歐洲佛教學和中國學的最高權威”。

全書共分兩章，第 1 章論述 8 世紀時在吐蕃贊普墀松德贊（孛悉籠臘贊，有人認爲此人是吐蕃贊普弃（隸）蹄贊和唐金城公主的兒子）主持下，由漢僧摩訶衍與印度僧侶蓮花戒在邏些（拉薩）就禪宗問題開展的一場大辯論。書中譯注了 P·4646 號敦煌寫本《頓悟大乘正理決》。它包括河西觀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作的叙、大辯

論的漢文檔案和摩訶衍呈贊普的三道表章。戴密微在長篇注釋中表現了他在梵藏文、佛教教理和經典方面的特長與淵博學問。第2章是史料疏議，譯注了一大批有關唐蕃關係的敦煌漢文文書（包括被吐蕃俘去的唐人詩文殘卷）。

耿昇譯

Paul Demiéville 著

吐蕃僧諍記（上）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譯叢序

季羨林

《詩經》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句話充分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之一：善于學習他人之長。再加上另外一個優秀品質：善于發明創造。這兩種品質合起來，就創造出來了長達五六千年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獨放异彩的光輝燦爛的文化。

學習他人之長，包括一切方面。專就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而論，同樣有向別的國家學習的任務。當然，在這裏，同在其他方面一樣，發明創造仍然居第一位。學習他人之長與發明創造。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輔相成。

五六十年以前，馮承鈞翻譯了大量的法國學者關於敦煌吐魯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論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擴大了我們的眼界，至今學者蒙受其益。其間還有許多學者，如向達、賀昌群、方壯猷、姚枬、朱杰勤、王左魯、張小柳、何建民等等先後翻譯介紹了不少日本、法國、英國等國的學者有關這方面的論著，國內學人至今還感謝他們。可惜的是，從那時以後，學者大都忙于自己

* 本序言是季先生為《敦煌吐魯番研究譯叢》專撰。儘管本書現已不再作為該譯叢之一而出版了，但我仍不忍割愛，依然將季先生的大序置于卷前。多聆聽老一輩的教誨，會使我們受益匪淺。

耿昇

的名山事業，翻譯介紹之事，祇是偶一爲之，像馮承鈞先生的那種鍥而不捨終身從事的勁頭，而今真已成廣陵散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的憾事。

一個人，不管有多麼大的學習語言的才能，決不能精通所有的語言。因此，就有必要看別人的翻譯。我常常看到或聽到有人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流露出鄙薄翻譯之意，我深以爲異。如果沒有翻譯，古代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文化就能傳到中國來嗎？如果沒有翻譯，歐洲文化能傳到中國來嗎？

時至今日，我們要學習的東西日益增多，我們要研究的課題之廣度與深度日益加強，我們不可能廣泛閱讀所有原著，我們更有必要參看別人的翻譯。這一點，對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來說，更是迫在眉睫。這種學問是最近七八十年以來新興起來的。在過去，由于有廣泛的國際協作，纔能取得如此令人興奮的成績。今後這種協作祇能加強，而萬萬不能削弱。特別是日本學者和法國學者在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們借鑒。我們必須繼承老一輩學者那種勤于翻譯的傳統，更進而發揚光大之，否則要想開創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新局面是決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這些考慮，我們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決定出一套研究譯叢。請一些專門或者主要從事翻譯介紹的同志們參加翻譯。我們也希望，其他同行們在著作之餘，也能選擇一些有價值的國外論著加以逐譯，以饗國內學人；大家共同努力，把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使我們的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更多，研究水平一天比一天更高。

1984年8月1日

譯者的話

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所著《吐蕃僧諍記》是一部名著。此書于1952年作為法國漢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文庫第七卷在巴黎出版，由法國大學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刊行，由法國國立印書局（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印刷。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指出的那樣，其內容是關於“中印僧侶于8世紀在拉薩舉行的一次有關禪的大辯論會”的史料。書中發表了許多敦煌寫本，尤其是巴黎國立圖書館第4646號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即《頓悟大乘正理決》。作者作了許多詳細的考訂，至今仍不失其參考價值，可備一說。所以我們纔決定將此書譯成漢文。

作者把本書作為“第一卷”，他在前言裏也說第二卷將是有關佛教教理和禪宗史的概觀，但直到戴密微于1979年去世為止，尚未能見其問世。

作者在文中引用了許多漢籍資料，其中又多為僻書，敦煌文書中的標點與分段更難定奪；有關漢籍二十四史的引文有許多地方也與現今中華書局標點本的斷句、標點和分段有所不同，為了忠于原義，我們都是根據原法文版而斷句、加標點和分段落的。對於書中所發表的敦煌寫本，我們也採取了同樣的處理辦法。

本書是在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譯出來的。中央民族學院藏語系王堯教授給予了我們親切的關懷和諄諄指導。他多次全文校對和修改譯稿，為我們解決了許多業務

和語言方面的困難。我國佛教學和西藏學的老前輩、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的王森教授向我們提出不少寶貴意見，修改了原譯稿中的一些紕漏。張毅、崔永乾、穆根來和單清江同志也幫了我們很大的忙，我們謹在此一一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原名為《拉薩僧諍記》，我們根據戴密微先生本人于1970年所提出的改正意見而譯作《吐蕃僧諍記》。原書中有大量腳注，為方便排版起見，所以又改為夾行注，同時又將原書末所附的《索引》改為《譯名對照表》。對於書末所附的《頓悟大乘正理決》敦煌文書的影印圖版，考慮再翻拍效果不好，所以刪去不用。

由于我們水平所限，錯誤在所難免，尚望讀者指正為幸。

1980年8月15日

再版序言

在國內圖書市場已絕迹多年的法國著名中國學家戴密微先生的世界名著《吐蕃僧諍記》，經歷艱辛，終於再版了。由於此書是譯作于八十年代初，剛涉足學術譯壇時翻譯的，20年的時光過去了，當時的許多未盡之言，今天也該一吐為快了。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是當代法國著名中國學家，他于1894年9月13日誕生于瑞士洛桑，1979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他1919年在伯爾尼中學畢業之後先後赴慕尼黑、倫敦、愛丁堡和巴黎求學深造。1914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投在當時西方的中國學名流席微葉和沙畹門下，陸續學習了日文、梵文、藏文和印歐語系許多語種。戴密微1918年在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畢業後，于1919年成為當時設在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的公費學員。他1919年赴中國考察，1924—1926年間在廈門大學執教席，講授梵文和西方哲學。他1926年赴日本，先任日佛會館會長，1929—1930年間任佛教百科性刊物《法寶義林》主編。戴密微在遠東生活十多年，1930年返法國，先在東方現代語言學院任教，從1945年起在高等實驗學院繼馬伯樂任歷史語言系的研究導師，從次年起繼伯希和主持法蘭西學院的中國語言和文明講座，直到1946年退休。戴氏中國學著作共160多篇（部），書評100多篇。

戴密微的藏學、敦煌學和佛教學名著就是他于1952年作為《漢學研究所文庫》第八卷而出版的《拉薩僧諍記》

一書。該書涉及到了唐史、吐蕃史、唐蕃關係史、西域史、佛教史、禪宗入蕃史、吐蕃進出中亞史諸領域。他的學生和事業繼承人後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和科學院院士的謝和耐先生于 1979 年在《通報》中撰文稱該書“每一條注釋都堪稱百科全書的一大條目”。日本著名敦煌學家藤枝晃也稱該書是“當代歐洲佛教學和中國學的最高權威”。全書共分兩章，第 1 章論述 8 世紀時在吐蕃贊普墀松德贊（掌悉籠臘贊，有人認為此人是吐蕃贊普弃（隸）踏贊和唐金城公主的兒子）主持下，由漢僧摩訶衍與印度僧侶蓮花戒在邏些（拉薩）就禪宗問題開展的一場大辯論。書中澤注了 P.4646 號敦煌寫本《頓悟大乘正理決》。它包括河西觀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作的叙、大辯論的漢文檔案和摩訶衍呈贊普的三道表章。戴密微在長篇注釋中表現了他在梵藏文、佛教教理和經典方面的特長與淵博學問。第二章是史料疏議，譯注了一大批有關唐蕃關係的敦煌漢文文書（包括被吐蕃俘去的唐人詩文殘卷）。他首次刊布了一大批有關唐蕃關係的敦煌寫本，提供了許多不見諸漢藏史籍的資料。此書中得出的沙州（敦煌）于貞元三年（787 年）陷落入吐蕃的結論現已成為西方普遍接受的觀點。此書實際上曾得到我國學者王重民多方面的幫助。

這次僧爭對於藏傳佛教史，尤其是對於吐蕃的禪宗史具有決定性意義。但這一事件不見諸漢文載籍，惟有晚期根據傳說或第二手資料寫成的藏文著作《拔協》（14 世紀）、《王統世系明鑒》（1388）、布頓《善逝教法史》（1322）及《賢者喜宴》（1545—1565）中略有記載。敦煌藏文寫本中也有記載（如 Pt. 823 號）。但敦煌寫本與晚期藏文著作中的記載完全不同，主要是表現在有關這次僧爭會的

結果問題上。藏文著作認為是印度人獲勝，吐蕃贊普反對漢僧摩訶衍一方。敦煌寫本却認為漢僧于辯論中大獲全勝，吐蕃贊普允許摩訶衍等在吐蕃傳播禪宗并取得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員在內的一批吐蕃人皈依禪宗，祇是由于吐蕃王宮某些大相“謀結朋黨”，漢僧纔受迫害。藏文著作是晚期的傳說，敦煌寫本則是在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或是同時寫成的，為該檔案作序的世俗文人王錫就是見證人，奉大師之命作序，所以它更為翔實可靠一些。

戴密微 1960 年在冢本善隆祝壽文集《佛教史論叢》中發表《有關中國禪宗的兩卷敦煌漢文寫本》一文。2672 號敦煌寫本也是有關這次僧爭會的，基本與 P.4646 相同，但多 20 頁，個別措辭和句子也略有差異。戴氏對這兩卷寫本對照比較後，互相參照作了校勘，使之成為一部非常寶貴的小部佛典。

戴氏著作發表 30 多年來，對這次僧爭會的爭論越來越激烈。意大利藏學家圖齊 1958 年在《小部佛典》第二卷中根據晚期藏文史料，尤其是根據《賢者喜宴》而反對“拉薩僧爭會”一說。他認為這場大辯論是在桑耶寺舉行的，提出了“桑耶寺僧爭會”之說。1964 年，日本禪宗研究專家上山大峻又發現了一卷叫作《大乘二十二問本》的敦煌漢文寫本，其內容也是針對這次僧爭會的。他于是便得出結論認為共舉行過兩次討論會，第一次摩訶衍獲勝，第二次蓮花戒獲勝。戴密微 1970 年在《通報》中發表近 10 萬字的書評《敦煌學近作》，對日、英、法、美、意、匈、新加坡以及我國港臺 22 篇（部）敦煌學著作作了評價。他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放棄“拉薩僧爭”而接受“吐蕃僧爭”一說。他認為從未舉行過一次或兩次面對面的僧爭會，祇

不過是持續了數年的一場筆墨官司，因而建議將其書易名為《吐蕃僧諍記》。日裔法國學者今枝由郎 1975 年在敦煌藏文寫本中找到了有關這次僧諍會的文書，也支持“吐蕃僧諍”一說。日本一批後起之秀也參加了這場辯論。戴密微 1979 年在《敦煌學論文集》第一卷（于他死後出版）中發表了《從敦煌寫本看漢地佛教傳入吐蕃的歷史》，對這批日文著作作了分析。他又根據《歷代法寶記》和《楞伽師資記》等敦煌漢文寫本以及《拔協》等晚期藏文著作而提出由無住（714—774），及其師無相（684—762）為代表的四川“成都宗”在禪宗傳入吐蕃中所起的作用。新羅僧無相就是《拔協》中的金和尚，曾于 750—760 年間會見墀松德贊的使者。英國學者呂埃格（D.Seyfort Rugg）于 1986 年在漢堡召開的第三十二屆亞洲和北非人文科學討論會上發表了《有關吐蕃僧諍的三種藏文文獻》一文（該論文集于 1992 年在斯圖加特出版），日本禪宗專家上山大峻于 1988 年 10 月 4 日—8 日在日本龍谷大學舉行的法日兩學者參加的《出自西域的文獻和檔案》科學討論會上又發表了《吐蕃僧諍的新視野》（該論文集于 1990 年在京都出版）。所有這些論文都對這次僧諍作了全新研究。1992 年 10 月，呂埃格教授告訴譯者，他即將出版有關這次僧諍的新專著，主要是從藏文文獻中尋求資料。令人遺憾的是譯者至今尚未讀到此書。

這場有關吐蕃僧諍的大辯論促成了法國研究有關吐蕃古代史的敦煌文書的一次高潮，而且波及到了歐洲、日本、中國等許多國家。

正如譯者于本序言一開始就曾指出的那樣，此書是譯者于 20 世紀八十年代剛從外事口轉到中國社科院時翻譯

的。戴密微是一位世界級的中國學大師，《吐蕃僧諍記》又是一部世界範圍內的多學科領域中的名著。書中廣徵博引，引證了大量的稀見敦煌文書和其他西域出土文書、頗難核對的漢文典籍和藏文、梵文以及當代東西方學者的有關著述。就其文字而言，書中大量使用了當代西方語言、日文、藏文、梵文、突厥文、蒙古文和其他西域死文字。爲了迎合西方讀者的鑒賞力，作者又利用西方哲學，特別是天主教的術語來論述藏傳佛教，用西方的行政詞匯來論述中國的典章制度。這樣一來，若將該書從法文譯作英文或當代其他西文，則相對容易，而譯成漢文就太難了。我記得英國學者呂埃格曾對譯者講過，英美有不少學者想把此書譯成英文出版，終未成功。當譯者與法國學者講到已將該書譯成漢文時，他們都驚訝地表示“難以置信”。由此可見本書翻譯的困難程度。

此外難度極大。作者原書中也有不少錯誤，這在一部開拓性的著作中也是難免的。該書的法文版于1986年在巴黎再版，當時的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侯思孟（Donald Holzman）已作了部分更正。但由於譯者太忙，無法再將漢譯本重新校對一遍了，甚爲遺憾。

譯者水平有限，錯誤與欠妥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不勝感激！

耿昇識

1999年7月10日于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前 言

本書（至少是第一卷）的資料主要是取自于敦煌漢文寫本，其中大部分是由現任北京圖書館館長王重民先生推薦給我的。他甚至還很盛情地送給我他的一組數量很大的影印件或手抄件，這是他于1934—1939年間協助巴黎國立圖書館為伯希和敦煌漢文文書編目期間在巴黎和倫敦親自編製的。王重民先生已經出版或介紹了保存在伯希和檔案中以及保存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的許多敦煌漢文文書，他發現了這些寫本之間的同一性和相互關係【這些文獻沒有一卷是關於吐蕃的。參閱1936—1941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的王重民所著的兩冊《巴黎敦煌殘卷叙錄》；1935年6月出版的《圖書季刊》第2卷，第2期，第71—84頁；1935年9月出版的第2卷，第3期，第159—168頁以及1939年3月的新編第1卷，第1期，第4—14頁；1935年7—8月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卷，第4期，第1—5頁；1935年11—12月出版的第9卷，第6期，第5—32頁；1936年1—2月出版的第10卷，第1期，第1—46頁；1936年11—12月出版的第10卷，第6期，第1—16頁；1935年11月出版的《金陵學報》第5卷，第2期；1950年上海出版的《敦煌曲子詞集》等書】。

王重民打算一旦在情況允許時就在中國發表一部主要是有關漢藏關係的重要資料集。本書翻譯和研究的都是這些文獻之中未曾刊布過的資料。當然，我也參閱了全部引文中所提到的資料的原件。

在預計王重民先生的作品即將出版的時候，我盡力避免全文轉抄或發表敦煌寫本原件，而祇限于在注釋裏引用一些主要段落（并按照西方的方式加了標點）。但最主要的一件原寫本在本卷書末尾影印發表，而且我也全文譯出；對其它寫本原件則僅限于進行一般性的分析和摘要。全文解釋則必需冗長和枯燥的注釋，因為大部分文書都是殘卷，常常又是錯誤百出和含糊不清，或充滿着毫無意義的文學含蓄。我認為應該祇注意其實質性的東西，所以對那些祇進行了翻譯而未加概括的各段落都用引號或小字體標明。因此，本書祇有志于粗略分析一下有關漢、藏關係的資料，這也是我最初認識王重民先生的結果。在多次友好的會見中，他以其淵博的書目學知識慷慨地幫助我撰寫本書。我不禁惋惜地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幾年。那時，每逢星期三，他總會給我帶來他一周來的最新發現，我們一起度過一整天以共同鑽研，一起查閱《大正新修大藏經》和西方西藏學家們的著作。

我在本書中也沒有系統地使用唐代有關吐蕃的漢文經典資料，因為這些資料不但面很廣，而且其編目工作也搞得很糟糕，幾乎從未有人對這些史料（尤其是對史料的來源）進行過考證性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文獻是《唐書》和《舊唐書》中有關吐蕃的幾卷。伯希和于1920年和1921年在法蘭西學院兩度講授過有關西藏古代史的課，并將新、舊唐書中的這幾卷譯成了法文，可惜它僅僅是初稿，未加注釋，而且也過時了。這一譯文不久將由L. 韓百詩先生在《伯希和遺著》中發表，但我沒有使用它。S.W. 巴沙爾于1880年在《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第12卷，第435—537頁上發表的英文舊譯本也過時了。而且在閱讀時還必

須參照原文，我祇參閱而沒有使用它，祇簡單地稱爲“巴沙爾譯文”而列在書中。《舊唐書》成書于 945 年，我是根據 1888 年上海出版的《圖書集成》版本引用的，書名祇縮寫成《舊》字；《唐書》（成書于 1060 年，同一版本）的書名祇縮寫成《唐》字；《資治通鑒》（成書于 1085 年，根據 1900 年《圖書集成》的版本引用）的書名祇縮寫成《資》字；《資治通鑒考異》（1085 年成書，根據《四部叢刊》版本引用）祇用縮寫詞《考異》來代替；《冊府元龜》（1013 年成書，根據 1754 年版本引用）的書名祇縮寫成《冊》字【爲了閱讀和查對的方便，本譯文仍標明了所引書的全稱。——譯者】。這後一部書雖然很有價值，但查閱起來却很不方便，我祇使用了其中有關“外臣部”的最後幾卷（即 966—1000 卷）。我應該感謝已故的林藜光對其中年代學的考證，他生前爲了自己使用而整理了有關吐蕃幾卷的某些段落；承蒙 R. 戴何都先生美意借給我日本東京 1938 年出版的《冊府元龜》第 152—164 卷，第 966—1000 卷的索引，我同樣也有所參照；《通典》（801 年成書）是根據《九通》的木刻版本（浙江書局 1882 年版）引用的；《唐會要》（961 年成書）是根據江蘇書局 1884 年版本所引用；《唐大詔令集》（1070 年寫成）是根據《涉園叢書》的版本引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包括的佛教著作是日本最新版本的佛教經典，我祇用字母“T”來表示，隨後附有該書中佛經的編號，偶爾也用羅馬數字來表示各卷的編號。

我幾乎從未親自使用過藏文史料的原件，因爲我並不精通這一語言。本書是一部漢學家的著作，所以大家就應該原諒它強調了唐朝對吐蕃佛教起源所起的作用。我的西藏學同事們。諸如 M. 拉露小姐、J. 巴科和 R. A. 石泰